

二十世纪以来竹林七贤研究述评

刘怀荣 石飞飞

(青岛大学 文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二十世纪以来,竹林七贤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起步、缓慢发展、多元推进、快速发展四个时期;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献研究、文学研究、其它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四个方面。总体来看,前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多围绕阮籍、嵇康展开,论题相对单一;到了后两个时期,研究方法日渐多样,研究视野和领域大为拓展。不仅成果数量明显增加,相关专题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而且研究质量也有显著的提高。虽然还有明显的不足,但无论著作还是论文,都出现了不少具有鲜明创新特征的力作。梳理这一百多年来的竹林七贤研究史,可总结得失,明辨方向,为下一步的研究寻找新的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竹林七贤;学术史;阮籍;嵇康;专题;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3)01-0078-12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竹林七贤做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立足百年来的学术发展史,总结竹林七贤研究的得失,为下一步的研究寻找新的突破口,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拟从纵、横两条线索入手,对百年来的竹林七贤研究史做一初步的梳理、总结。

—

从纵向发展来看,20世纪以来竹林七贤研究的成果颇为可观,据我们的统计,共有著作100部,论文1626篇。由于受外在环境及学者自身认识的影响,各个阶段的研究情况又有较大的不同。总体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起步期(1917-1948)、缓慢发展期(1949-1979)、多元推进期(1980-1999)、快速发展期(2000-2011)。

(一)起步期(1917-1948)

19世纪末以来,新学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竹林七贤的研究也不例外。

1917-1948年,研究阮籍、嵇康的相关著作有8部,论文有28篇,代表性论著有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出由关注作家生平行事向关注他们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关系,及由传统的简要评点向细致、深入的探究转型的特点。

1917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国文门讲授文学史时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他在讲义中指出:“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辈出。其文约分两派:一派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总采聘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盛于竹林诸贤。溯其远源,则阮禹、陈琳已开其始。惟阮、陈不善持论,孔、王虽善持论,而不能藻以玄思,故世之论魏、晋文学,昧其远源之所出。”刘师培认为,嵇、阮的文都“艳逸壮丽”,嵇

收稿日期:2012-11-20

作者简介:刘怀荣(1965-),男,山西岚县人,青岛大学特聘教授、文学院副院长,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诗歌与诗学及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研究;石飞飞(1987-),女,青岛人,青岛大学文学院2010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文近汉孔融,析理绵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汉祢衡,托体高健,嵇所不及”;嵇、阮诗“则为体迥异,大抵嵇诗清峻,而阮诗高浑。彦和所谓遥深,即阮诗之旨言,非谓阮诗之体也”。^{[1](P39-51)}

1927年,鲁迅在广州发表演讲指出:阮籍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2](P499-501)} 鲁迅此次演讲是揭发国民党“四一二”屠杀的残暴,赞扬阮籍、嵇康的反抗精神,体现了学术可以为政治服务的特点。同时,此文还对竹林七贤与酒等文化的关系作了初步探索。1928年出版的胡适《白话文学史》也论及阮籍:“五言诗体起于汉代的无名诗人,经过建安时代许多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阮籍是第一个用全力做五言诗的人;诗的体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诗的范围到他方才扩充到无所不包的地位。”^{[3](P72)}

1931年,陆侃如、冯阮君在合作出版的《中国诗史》中指出,阮籍82首《咏怀诗》以“无常”为中心思想。^{[4](P273)} 1941年出版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则将竹林七贤与建安七子相比较,并指出《咏怀诗》其一的“忧思伤心”是阮籍咏怀诗的中心意境。^{[5](P190-192)} 刘大杰基本上采取了文学、史学、哲学互证的研究方法,且能从文学的总体发展视角审视阮籍其人其作。

这一阶段是近代竹林七贤研究的起步期,从刘师培到鲁迅,再到刘大杰,从对阮籍、嵇康诗文作简明、精到的概述到探讨阮籍、嵇康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再到对《咏怀诗》作重点论述,初步体现了竹林七贤研究的学术发展特点。其它如徐绍烈《阮籍的思想及其作品》(《学灯》1923年10月19日)、容肇祖《述阮籍嵇康的思想》(《语言历史所周刊》1928年第5期)、刘荣杰《竹林七贤任诞行为与其分道扬镳之探讨》(《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学报》1929年第1期)等论文也出现较早,但成果不显著。

(二)缓慢发展期(1949-1979)

这一时期有总论“竹林七贤”的专著1部,论文6篇;研究阮籍的著作4部,研究嵇康的著作3部,研究阮籍、嵇康的论文各10篇左右。除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和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外,研究的重点转向阮籍、嵇康与政治的关系,同时,出现了一批从文学、考古、音乐、养生等角度切入的成果,但因受政治大气候的影响,成果数量较少,也少有力作。

1954年出版的林庚《中国文学简史》指出:“屈原所主张的‘举贤授能’的民主政治,在建安时代的基础上,就初步的被争取到。更具体的例子,如嵇康临刑时有三千太学生请愿营救他,并且要求以他为师,这就是民主的力量……名士的被害,也就是封建社会中民主成分的被摧残,正始时期因此就成为文坛的低沉时期,当时除了阮籍,整个时代几乎是沉默的。”^{[6](P174-175)} 由北京大学1955级学生编著、出版于1959年的《中国文学史》指出:“(阮籍)曾有过积极的志向,只因现实政治太黑暗,太恐怖,才变得放荡起来。他的放荡是一种消极遁世,腐朽纵欲的行径,但在不同流合污一点上,又有与现实对抗的意义。”^{[7](P141-143)} 同年,出现了两篇探讨阮籍、嵇康与政治关系的代表性论文,霍松林《论嵇康》认为,嵇康在行动上反抗黑暗的现实极为激烈,但在作品中却流露了远祸全身、消极退隐的情绪,这“是他的尖锐的思想矛盾的具体表现”;“他的反抗和被杀害,充分表明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他的不肯同流合污、坚决反抗到底的高尚品质”。^[8] 这与北大版《中国文学史》对嵇康的评论不同。高海夫认为:“阮籍没有能把他的视线从统治阶级或者说上流社会那个狭小的圈子里解脱出来,转向广大的人民大众,反映他们的生活与痛苦、希冀与要求,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他的诗歌的现实意义的广阔与深刻性。”^[9] 此外,罗贤《如何评介嵇康》(《文汇报》1959年3月28日)认为嵇康“始终是统治阶级的异己分子”,是“统治阶级的叛逆子孙”,圣贵、姚国华《也谈如何评价嵇康》(《文汇报》1959年4月17日)、何世华《试论嵇康》(《人文杂志》1959年第4期)、(台湾)何启民《竹林七

贤与魏晋政局》(《教育与文化》1974年7月-12月)等都是将阮籍、嵇康的研究与政治相联系,显示出学术受政治影响的痕迹。

1961年,陈直发表《对于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砖刻竹林七贤图的管见》(《文物》第10期),这是借助考古新发现研究竹林七贤的较早尝试;1963年联抗发表《音乐家嵇康》(《人民音乐》第12期)、1965年乔象钟发表《宣扬封建士大夫思想的小说——广陵散》(《文学评论》第1期)都探讨了嵇康的音乐思想;1973年刘秉果《嵇康的养生论》(《体育文史》第3期)探讨了嵇康的养生思想,这些都表现出竹林七贤研究领域的拓展。其它如日本学者松本幸《阮籍的生涯和咏怀诗》(木耳社1977年版)、法国学者侯思孟《诗歌与政治:阮籍的生平与创作》(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等专著、郭维森《嵇康思想及其诗文的特点》(《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陈赓平《阮籍咏怀诗探解》(《兰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陆钊琰《关于竹林之游的时间》(《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等论文,都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推进。

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国内学者的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围绕政治立论的成果较多,二是研究者关注阮籍、嵇康较多,对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作家鲜有涉及。因此,研究范围相对较窄,论题也比较单一。

(三)多元化推进期(1980-1999)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与历史、哲学思想、政治制度、宗教、民俗的多向关系,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竹林七贤的研究也进入了多元化推进时期。就研究成果而言,通论“竹林七贤”的著作11部,研究论文44篇;阮籍研究著作23部,研究论文121篇;嵇康研究著作20部,研究论文165篇;山涛研究论文10篇;向秀研究论文12篇;刘伶研究论文6篇;王戎研究论文3篇;阮咸研究论文5篇;与20世纪前70年相比,在研究数量及质量上都非常可观。这一阶段,竹林七贤研究由传统的简单评论成功转向以文本的

细致解读为主;阮籍、嵇康的玄学思想开始出现专论;阮籍、嵇康诗歌与美学的关联也得到重视;同时,也出现了阮籍、嵇康心态、接受史、宗教观研究的论著,这些都是竹林七贤研究得到多元化推进的重要标志。

1980年出版的(台湾)邱镇京《阮籍咏怀诗研究》将阮籍的咏怀诗分为“自述诗”、“讽刺诗”、“伤感诗”、“忧生诗”、“隐逸诗”,认为阮籍咏怀诗在内容方面的特征表现在“文多隐避”与“悲郁凄怆”。邱镇京还探讨了《咏怀诗》艺术方面的优缺点,^{[10](P127-222)}其分析细致深入,值得重视。

1987年,余敦康撰文指出:“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共同特征,表现为在原来的精神支柱崩溃以后承受了巨大的内心痛苦继续从事新的探索。从他们原来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相结合的思想来看,基本上和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是相一致的。但是他们后来所从事的新的探索……代表了玄学思潮的一次重大的自我深化。”^[11]这是较早的从玄学角度探讨阮籍、嵇康思想的研究成果。

1988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认为,嵇康诗风清峻互融,以“峻”为核心,主要体现在“他对世俗荣华的指责”及对“委心自然、服食游仙的追求”,前者“表现为‘切’与‘直’的批评性”,后者“则表现出‘清’的脱俗性”;而“绝俗人格之抒写,使嵇康诗形成了高峻清脱的特殊风格”。此论体现出王先生从审美心理、美学等多角度研究的特点,是重建科学文学史观的新尝试。1993年出版的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一改考索《咏怀诗》各篇寓意及本事的传统研究方式,开始探讨《咏怀诗》的美学特征、整体结构,指出《咏怀诗》“宏大的视野及由此产生的意境,形成组诗雄浑壮美的风格,显示出笔参造化、学究天人的气象”。^{[12](P147-148)}

1991年,罗宗强撰文指出,嵇康“以己为高洁,以世俗为污浊的心态”,主要表现在其厌恶仕途和“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的人生悲剧,其实也是玄学理论的悲剧;“还纠结着当时士人与政权的关系的种种复杂因素。”^[13]罗宗强从心态和

详见本书另一版本: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202页。

玄学角度对嵇康所做的解读,“标志着我们古典文学研究走向成熟”。^{[13](P8)}徐公持于1998年撰文探讨了两晋“嵇康情结”的发展和演变,指出:西晋时皇权正盛,但“嵇康情结”的存在不容置疑,只是较为谨慎,尤其不敢谈及嵇康之死;东晋时期,“嵇康情结”有增无减,表现为涉及人数的增多和情绪力度的加大。^[14]这是嵇康接受史研究的成功尝试。1999年,高华平撰文指出:“嵇康确是魏晋时期的一名虔诚的道教信徒”,“阮籍所信奉或倾向的宗教,并非当时的本土道教,而是新兴的天竺佛教。”^[15]他还以酒为研究媒介,探讨了嵇康与道教、阮籍与佛教的关系。

此外,20世纪80年代,何启民《中国历代思想家——嵇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日本汉学会报《中国文化》第42、43期与《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8、39期分别刊登了沼口胜先探讨阮籍《东平》、《首阳》、《猕猴》的文章,他还对《咏怀诗》的修辞方法及其与《诗经》的关系作了一定分析。1990年,森田浩一《徘徊与逍遥——阮籍咏怀诗的一点考察》(《中国文学报》1990年第41期)等都是研究竹林七贤的佳作。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从1980年到1999年发展的20多年间,竹林七贤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突破,文、史、哲相结合的研究特点愈加明显,从玄学、美学、宗教、文人心态、接受史等多角度切入的探索,使研究成果内容更为丰富,标志着竹林七贤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期。

(四)快速发展期(2000-2011)

二十一世纪以来,有通论“竹林七贤”的著作21部,论文138篇;阮籍研究著作11部,论文359篇;嵇康研究著作15部,论文405篇;山涛研究论文29篇;向秀研究论文39篇;刘伶研究论文21篇;王戎研究论文26篇;阮咸研究论文4篇。竹林七贤研究的全面推进是这一阶段研究最显著的特点;对以往较有争议的问题的深刻挖掘、思考,使竹林七贤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相

关学术活动的开展,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活跃。这些都从不同侧面显示出竹林七贤研究的兴盛。

中州古籍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了曾春海的《嵇康的精神世界》,该书共9章,约17万字,涉及到嵇康的生平事略、时代环境、生命才情、论辩方法、诗文特色,及其自然观、人性观、生死观、养生论、宅卜吉凶说、声无哀乐论、政治社会思想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并附有嵇康年表、嵇康研究论著目录,资料详实准确,论述清晰流畅,对嵇康的评解非常中肯,是一部多层次综合研究嵇康的著作。2011年,卫绍生发表《竹林七贤: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一文,分别论述竹林七贤“称谓的由来”、“缘何聚于山阳”、“人生态度”、“处事方式”、“文学创作”、“艺术风采”等六方面,^[16]对以往的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这一时期,对于诸如阮籍的政治态度、《咏怀诗》是否是组诗、《为郑冲劝晋王笺》写作时间等有争议的问题,做了更深入的讨论。2003年,孙明君出版的《汉魏文学与政治》一书对以往阮籍“心系曹魏痛恨司马氏”、“依附或歌颂司马氏”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也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小人,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对阮籍而言是被利用被强迫的,从而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合作关系”。2008年,钱志熙针对《咏怀诗》是否为组诗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指出:“其原本写作形式,就带有系列的组诗的性质”;“阮籍的咏怀诗的主题与内容,呈现着一种逻辑展开的层次。联系着这一逻辑层次的,正是阮籍自身的思想上的逻辑层次;更进一步说,这是正始时期的一些现实问题与思想文化在阮诗上的投影的结果。”^[17]他还明确指出《咏怀诗》“其一”为序诗。^{[18](P253)}对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创作时间,早在1935年,刘汝霖就提出了景元二年(261年)八月说。针对这一观点,顾农

详见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9-160页,持论相似的如韩理洲《“不贰忠臣论”是误解阮籍咏怀诗的总根源》(载《人文杂志》1999年第4期)。

详见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7页,持论相同的还有吴从祥《谈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的写作时间》(载《铜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

于2000年提出当在甘露三年(258)五月说,^[19]孙明君认为应在甘露五年(260)四月,^[20]李晓敏认为应在景元元年(260)六月。^[21]此外,家浚《广陵散 果系嵇康所作吗》(《贵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王德坝《十八拍 广陵散 确系嵇康所作——答家浚同志》(《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进行了争论;2004年《鲁迅研究月刊》刊登过思庵《嵇康集 跋中的一处标点错误》(第7期)和司岩《嵇康集 跋中的一处标点不错》(第12期)两篇论文,对《嵇康集》中的标点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争论,大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新思考,对于推进学术研究是有益的。

自2006年以来,中国云台山“竹林七贤”学术研讨会以每两年一届的周期连续召开了四届学术会议。其中,首届“中国·修武云台山竹林七贤学术研讨会”由河南省修武县委、县政府主办,《寻根》杂志社、《中州学刊》杂志社协办,于2006年10月在云台山举行;第二届“中国·修武云台山竹林七贤学术研讨会”,由中共修武县委、县政府和寻根杂志社、中州学刊杂志社联合举办,于2008年10月在河南修武举行;中国·云台山第三届竹林七贤文化研讨会,由河南省社科院和焦作市政府主办、修武县政府承办,于2010年11月在河南省修武县举行;中国云台山第四届竹林七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焦作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与修武县人民政府承办,于2012年11月在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举行。四届会议主办单位的不断升级,也反映了竹林七贤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地方政府的重视。

总的来看,竹林七贤研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研究方法由传统的评点、考据和校勘,到重视文学与哲学、史学、社会政治等之间的关系,再到重视文本细读和诗文内部研究,已相当成熟。其间,日本、法国等国家及台湾、香港等地的学者,与国内大陆学术界,学术论著与学术会议,学术争鸣与媒体宣传遥相呼应,共同促成了竹林七贤研

究的兴盛局面。

二

百年来,竹林七贤的研究成果集中于文献研究、文学研究、其它专题研究、比较研究这四个方面。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回顾和梳理,有助于我们从横向把握竹林七贤研究的重点和特点。

(一)文献研究

百年来,学者们在竹林七贤诗文集的校注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竹林七贤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4年,鲁迅辑校的《嵇康集》^{[2](卷九)},以明代吴宽的丛书堂钞本为底本,力存原钞,除了将《嵇康集》原文进行细致谨慎的校勘外,还对版本源流以及逸文进行了考辨。此后,多种《嵇康集》注本都以鲁迅所校《嵇康集》为基础。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竹林七贤诗文集的校注成绩突出。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和1962年分别出版了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22]和戴明扬《嵇康集校注》。^[23]黄著将阮籍的82首五言《咏怀诗》和13首四言《咏怀诗》集中起来进行了详细的笺注,尤其是对阮籍13首四言《咏怀诗》的校注具有纠正学界偏颇的重要学术价值。戴著以明黄省曾嘉靖乙酉年仿宋刻本为底本,目次与鲁迅所校《嵇康集》基本相同,但时有纠正,是《嵇康集》校注的集大成著作。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的校注成果又有新突破。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于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分为上、下两卷,首次对阮籍诗文作了全面的校勘和注释,是迄今为止最好的《阮籍集》校注本。1990年,李景华《阮籍集校注 失误评议》(《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韩格平《阮籍集校注 补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第1期)等论文对此书曾提出过商榷和补正,这对阮籍集的校注工作起到完善作用。韩格平《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199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不仅辑录作品全面,校注详实,而且眉目清晰,是科普类与学术研究类著作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也是第一部对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进行全面校

也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竹林七贤的作品,如董育宁《阮籍诗用韵考》(载《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余红光《阮籍诗用韵考辨》(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注的著作。

(二)文学研究

百年来竹林七贤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咏怀诗》、《思旧赋》、《幽愤诗》、《大人先生传》等篇目的文学解读。

阮籍 82 首《咏怀诗》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论文,在拓宽研究视野的同时,深度上亦有所增加。学界逐渐将视角集中于《咏怀诗》的“生命意识”及其艺术特色研究。

1. 阮籍《咏怀诗》的生命意识研究。钱志熙指出:在阮籍 82 首咏怀诗中,“诗人以充分自觉化的生命置身于恶化的现实中……比之于前代诗人,阮籍对生命的伤感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自觉地继承了用诗歌抒发生命情绪的传统。《咏怀诗》82 首仍然是生命境界的诗,而且比起建安诗人,阮籍把诗的主题更纯粹地凝聚在生命问题上。”尚学锋指出:“阮籍的游仙诗充满了难以超越现实生命的苦闷情绪……以审美观照的方式表现对于理想生命境界的体验。”^{[24](P294)}王许林进一步探讨了“《咏怀诗》生命意识的几种表现形式和运动轨迹”,指出其生命意识表现在:“对时间意识易逝的敏感和忧患”、“抒发人的生命需要遭到压抑、摧残而产生的生命孤独感”、“追求从精神上解脱生的困扰和死的恐惧,实现生命的超越,达到永恒的慰藉”。^[25]

2. 阮籍《咏怀诗》的艺术特色研究。学界对《咏怀诗》风格、叙说方式、结构、语法等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徐公持指出:“《咏怀诗》在表现风格方面亦任情适性,体现自然精神。而于作者气质高洁清朗,诗歌境界超凡拔俗,加之有玄理虚胜气氛渲染衬托,故自然之外,又形成飘逸诗风。”^{[26](P191)}刘上江指出阮籍《咏怀诗》采取了“对受挫心理体验的否定思维”、“对死亡体验的隐晦诉说”、“对孤独体验的虚化”的诗学叙说方式。^[27]尚学锋探讨了《咏怀诗》“由思考人生困境到寻求自由超脱,回归精神故园”的情感结构及“富于玄学色彩的抒情模式”。^[28]赵沛霖认为《咏怀诗》的

线索为其出世思想的萌生、形成、发展和正式确立,并以第二十四、五十五为界,将《咏怀诗》划分为三个阶段,至第三个阶段,“诗人已经从出世远游中找到了‘快乐’”。^[29]李海燕从语法及篇章结构方面分析了其五言《咏怀诗》的张力。^[30]程怡具体探讨了《咏怀诗》“其三”的用典。^[31]王建国从阮籍的身世个性看其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象》(《贵州社会科学》2004 年第 2 期)秦丙坤《阮籍咏怀诗中的飞鸟意象和三重世界》(《贵州社会科学》2001 年第 6 期)王尧美《阮籍咏怀诗中的“路”》(《贵州社会科学》2003 年第 6 期)《阮籍咏怀诗中的“剑”》(《贵州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等则探讨了《咏怀诗》中的女性、飞鸟、路、剑等意象。邱镇京认为,阮籍咏怀诗艺术技巧优点为“结构紧凑”、“善于发端”、“比兴特佳”、“文法的技巧”缺点为“类似格言的缺点”、“隐晦的缺点”、“重复的缺点”、“合掌的缺点”;并指出,阮籍咏怀诗在形式方面“叠字频见”、“对偶自然”、“句法变化”。^{[10](P194-222)}

邓小军从《思旧赋》以李斯与嵇康相提并论的寓意、是否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等三方面做了较为充分的论证。^[32]日本学者甲斐胜二认为:“《思旧赋》里有向秀矛盾的心理,一面批评嵇康不善处世,一面对旧友的故居感到良心上的不安。”^[33]学界对《大人先生传》的原型分析有三种观点:徐公持认为“大人先生”是孙登,^{[34](P47)}韩传达则认为大人先生的原型是苏门先生,^{[35](P171)}王晓毅认为:“真正的原型是《庄子》中住在藐姑射山的神人,以及《淮南子》等黄老派著作中关于神人、至人、真人的传说。”^{[36](P203)}

随着中国文学研究体系的不断完善,对文学作品进行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对作品的纯文学解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由上面的论述可知,竹林七贤文学研究主要的成果集中在对阮籍《咏怀诗》内容、艺术特色的分析,同时,竹林七贤其它作品也得到

详见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2-263 页 相似的文章如鲁红平《论阮籍咏怀诗的生命情结》(载《湖南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

了深入研究。

(三)其它专题研究

百年来,竹林七贤与文化、美学、哲学、养生学、考古学等专题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体现了竹林七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1. 文化研究。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指出:“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2](P498)}孙昌武指出:“嵇康的养生思想作为道家、道教思想的发挥,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和养生思想相关联的他的独特的神仙观念,也具有突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在他的创作中,这两个方面被转化为文情和诗思表现出来,在文学史上创造具有特色的艺术成就,对后人 also 造成长远影响。”^[37]其它论文如阮忠的《论阮籍、嵇康诗歌的文化品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曾春海的《竹林七贤与酒》(《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刘康德的《嵇康锻铁、服药及其关系》(《复旦学报》1987年第2期)、黄霞平的《向秀〈难养生论〉中的养生观探析》(《理论界》2010年第2期)等从文化、酒、服药、养生等方面展开文化探究。

2. 美学思想研究。陈允峰指出:“嵇康的音乐审美主体观是一种关于审美主体差异性的思想……嵇康认为,存有不同情感的审美主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必然产生不同的美感效应;而是否具有超越嗜欲的能力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精神境界、情趣心境的差异,则决定了审美主体在欣赏郑声一类的至妙之音时出现不同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效果……(这)孕育出了重视和弘扬审美主体能动作用的美学思想。”^[38]他将美学的理论与视角运用到竹林七贤的研究中,对七贤美学思想的深入探讨与挖掘起到了巨大推进作用。

具体篇目的美学思想探究集中在《声无哀乐论》、《琴赋》、《大人先生传》三篇。袁济喜结合魏晋时代特色,指出:“嵇康吸收了王弼等人提倡‘得意忘言论’的合理因素,形成了自己‘天地和美’的美学观和创作倾向。他鲜明地提出‘越名教任

自然’。在音乐美学领域中,主张‘声无哀乐’,强调‘心之与声,明为二物’”^[39];嵇康美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和他受‘得意忘言论’影响的立论方法,经常发生冲突。这就需要我们从他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和把握其思想脉络。”^[39]《琴赋》的美学思想研究以李丹博为代表,他指出:“在《琴赋》中,‘和’美的要求贯穿于音乐创作的整个过程,包括乐器的特点、乐声的描绘及音乐创作的心理准备等各方面,而主要的表现是要创造一个清远、冲和、恬静、脱俗的音乐意境。”^[40]孙良水的《阮籍审美思想研究》认为,《大人先生传》是阮籍儒家的美学思想行不通之后的一种转变,那些“至人”、“真人”、“圣人”都是“大人先生”的化身,大人是庄、老、《易》三家思想的结合体,而且以庄子思想为主干。孙先生还进一步指出阮籍美学思想体现了从清通脱俗的美到矛盾冲突的崇高美与放犷美,再到超现实的理想美的转变。”^[41]

其它论文如修海林《论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声无哀乐论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孙泽山《阮籍的审美情趣》(《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祝菊贤《音乐的本质与自然之道——嵇康〈声无哀乐论〉美学思想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张荣明、刘明辉的《阮籍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孔子研究》2010年第2期)、程相占的《孔子音乐思想在阮籍、嵇康身上的延伸及其影响》(《孔子研究》1993年第3期)等,都从美学角度探讨了竹林七贤的作品。

3. 哲学思想研究。百年来,学界对竹林七贤哲学思想的研究大致视角非常广泛,玄、儒、道、释等思想的结合都有涉及,但这也存在众多泛泛而谈之作。下面就最为集中且质量较高的阮籍、嵇康与玄、儒思想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述。以丁冠之、余敦康为代表的学者探讨了阮籍、嵇康与玄学思想。丁氏将阮籍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正始以前、正始十年间、正始十年后,揭示了阮籍由儒转玄的思想演变过程。^[42]高晨阳大致在此基础上做了更深入的研究。^[43]余敦康则将阮籍玄学思想放在整个玄学思想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肯定了阮籍和嵇康竹林玄学的地位。^[44]他还以外郭险

恶的政治环境对理想与现实的影响为切入点,将阮籍的玄学思想分为:前期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后期则演变为自然。^[45]丁怀轸、丁怀超从贵无到自然、崇本举末到玄远放达、圣人理想到大人精神三个层面论述了阮籍对于正始玄学向竹林玄学发展所作的努力。^[46]刘康德《“竹林七贤”之有无与中古文化精神》由“竹林七贤之有”、“竹林七贤之无”出发,探讨了“中古时期的文化精神”,具体分析了“文化本体:研几”、“文化心态:负阴”、“文化表现:隐曲”三个方面,并认为,这种精神“在竹林七贤嵇康、阮籍等身上表现尤为突出,而这种文化精神一旦在中古时期形成和定型,就将对整个中国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47]

嵇康《声无哀乐论》与阮籍儒家礼乐观的关系探讨也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且目前仍存在争议。杨荫浏认为:嵇康“虽然接受一部分儒家的音乐思想”;他又否认音乐之应有政治性,“应起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在他的实践和他的理论之间是有矛盾的”。^{[48](P182,185)}原正幸《论嵇康〈声无哀乐论〉的礼乐批评》(《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嵇康受儒家与道家的交错影响。牛贵琥则认为:“用儒家、道家、玄学、儒道融合来比附、解释嵇康的音乐理论,都是不完整的。”^[49]此外,丁冠之撰文指出:嵇康的自然观、认识论和社会政治思想三者是紧密联系的,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在政治上反对名教之治,主张“越名教任自然”,“从整体来看,他是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50]

其它相关论文如刘康德的《试论嵇康的哲学思想与人格理论的关系》(《复旦学报》1981年第6期)、陈秀萍和李万轩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伦理思想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王晓毅的《阮籍〈达庄论〉与汉魏之际庄学》(《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等,多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推进。

4. “竹林七贤”名目考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寅恪先生首发新论,认为“竹林七贤”是东

晋人受佛教“格义”学风的影响,取释迦牟尼说法之处“竹林精舍”的名字,附会《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而成,并非历史实录。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竹林七贤之间的年龄差距及居地距离,使其不可能同时聚会于山阳,而且刘康德《“竹林七贤”之有无与中古文化精神》(《复旦学报》1991年第5期)推测“竹林七贤”标目是由谢安首创。持论相似的文章如周凤章《“竹林七贤”称名始于东晋谢安说》(《学术研究》1996年6期)、范子烨《“竹林七贤”之名目探源》(《学习与探索》1997年2期)、滕福海《“竹林七贤”称名依托佛书说质疑》(《温州师院学报》2002年第2期)认为竹林之游是历史事实,持论相似的如卫绍生《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李中华《“竹林之游”事迹考辨》(《江汉论坛》2001年第1期)。代表性论文如王晓毅《“竹林七贤”考》对陈寅恪等人的观点提出质疑,并能追溯原始的材料,论证了“竹林七贤”名号的现实性,而且指出这一名号由孙盛首创。^[51]其它学者的论述大致不出此范围。此外,韩传达《竹林之游三考》(《南京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蔡振翔《竹林名士交游考》(《求索》1993年第1期)等探讨了竹林之游成员,顾农《七贤林下之游的时间与方式》(《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4期)、李中华《“竹林之游”事迹考辨》(《江汉论坛》2001年第1期)探讨了竹林之游的时间、地点及活动方式,程峰《关于“竹林七贤”寓居地的思考》(《山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5期)、《竹林七贤寓居“河内山阳”地望辨析》(《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探讨了竹林七贤寓居地。

5. 墓室竹林七贤图的性质研究。墓室竹林七贤图的性质研究体现出文学与绘画、考古学、美学等方面的结合。1961年,陈直《对于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砖刻竹林七贤图的管见》(《文物》1961年第10期)一文揭开了竹林七贤壁画研究的序幕。几十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发掘,这一专题吸引了

参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载《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

如韩格平《竹林七贤名义考辨》(《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马鹏翔《“竹林七贤”名号之流传与东晋中前期政局》(《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2期)。

众多艺术专业、考古专业、文学专业的学者们的视线。伴随着研究的深入,竹林七贤壁画的性质问题越来越显现出其研讨的价值。据笔者目前所见材料来看,学界对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墓室壁画的性质的判断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以罗宗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竹林七贤是神仙或具有神仙性质,“儒、道、佛三种思想的混合”表现在文学艺术上“成为‘羽人戏虎’、‘羽人戏龙’、‘竹林七贤’一类壁画的主要内容。我们从画面上似乎可以看到墓室主人愚蠢的求仙思想和他们信仰佛法、崇尚玄学、清谈无为的空虚心理状态”;以韦正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墓室壁画中的竹林七贤具有现实性;以林圣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墓室壁画中的竹林七贤同时具备现实性与神仙性。

学界对阮籍的政治态度研究也有三种观点。陈赓平认为,阮籍不屑与司马昭结为儿女亲家,是因为阮籍心在魏室。徐公持指出:“(阮籍)步步退缩,甚至向司马氏淫威屈服。阮籍后期某些行为,可以视为向司马昭逐步靠拢。”孙明君则认为,阮籍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对阮籍而言是一种消极的合作关系。^{[52](P159-160)}

上述多项专题研究,不仅拓宽了竹林七贤的研究领域,也使研究工作获得了进一步深化,标志着竹林七贤研究的多方面推进和薪火相传的特点。

(四)比较研究

竹林七贤的比较研究以阮籍、嵇康的比较为主。据笔者目前所见,大致可以分为阮籍、嵇康与前人、同时代人、后世人的比较。

1. 阮籍、嵇康与前人的比较研究。阮籍、嵇康与老庄的比较研究较少,但学者们从音乐美学思想、人生观、理想人格等方面将阮籍、嵇康与庄子进行了比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伊爱华从“‘安时处顺’与‘刚肠疾恶’的处世之方”、“‘知之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与‘性命之遂,得之善求’”、“庄子‘真人’与嵇康‘内圣而外王’的理想人格”三方面探讨了庄子与嵇康人生观的异同;又从“社会环境、前人的思想文化影响及个人的社会经历”三方面探讨了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53]相似文章如郭平《阮籍、嵇康与老、庄音乐美学的比较》(《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苏罗《乱世之游者——阮籍与庄子比较研究》(《名作欣赏》2010年第2期)等。以吴可为代表的学者们探讨了嵇康的四言诗对《诗经》的继承,吴氏“从词法、句法、章法、韵法等层面加以比较阐述”;提出嵇康四言诗源于《诗经》‘国风’的观点”。陈林《乐论与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的原点比较》(《四川戏剧》2007年第6期)、南锡宪《阮籍、嵇康对乐记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理论学刊》1998年第4期)、祝凤梧《阮籍咏怀诗和诗经、楚辞的关系》(《湖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邓晶艳《抒情娱忧与回环往复——浅谈阮籍诗对楚辞的继承》(《贵阳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等探讨了阮籍嵇康对《乐论》、《乐记》、《楚辞》的继承关系。此外,虞德懋《曹植与嵇康诗歌气格比较》(《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常为群《矢志以后的歌哭——曹植、阮籍诗歌比较》(《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分别将阮籍、嵇康与

详见罗宗真《墓砖文字、纹饰和砖印壁画》,载《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138页。相似的文章如赵超的《从南京出土的南朝竹林七贤壁画谈开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3期)、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下编《南北朝墓葬中竹林七贤有荣启期画像的含义》(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等。

详见韦正《地下的名士图——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墓室壁画的性质》(《民族艺术》2005年第3期),首先提出此观点的是杨泓,详见杨泓《东晋、南朝拼镶砖画的源流及演变》,载《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详见台湾林圣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研究》(台北:台湾大学艺术史系研究所1993年硕士学位论文)。另外,姚义斌认为:“竹林七贤在整个南朝时代经历了一个由人向神转变的过程,与此同时,竹林七贤墓葬壁画也经历了一个由高士图向神仙图转变的过程。”详见其《竹林七贤墓葬壁画的图像学意义》(《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详见陈赓平《论阮籍的咏怀诗是魏晋易代的史诗——阮籍咏怀诗探解》(《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持论相同的还有马圣贵、姚国华的《也谈如何评价嵇康》(《文汇报》1959年4月17日)。

详见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183页,持论相似的还有牛贵琥《阮籍至东平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顾农《阮籍的政治态度及其作品》(《山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

详见吴可《嵇康四言诗源于“国风”论》(《名作欣赏》2010年第23期)相关的文章如王成《试论嵇康四言诗对诗经的取法借鉴》(《淮北煤师院学报》2001年第5期)、孙震芳《论嵇康四言诗对诗经的传承与开拓》(《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曹植进行了比较,周乐《浅析墨子“非乐论”与嵇康“声无哀乐论”异同》(《科教文汇》2008年第11期)将嵇康与墨子进行了比较,张克峰《曹丕杂诗(其一)与阮籍咏怀(其一)比较谈》(《井冈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顾农《阮氏父子比较论》(《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则分别将阮籍与曹丕、阮禹进行了比较。

2. 阮籍、嵇康与同时代人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阮籍与嵇康美学思想、人生道路、性格及文学创作等方面的比较。高晨阳从“理论形态及趋向之异同”、“对自然与名教关系理解之异同”、“理想精神境界的异同”、“人格结构的异同”四方面展开研究,认为:“嵇、阮的思想与人格,在同中有异,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共同体现着玄学自然论的特质、时代的精神风貌以及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54]汪春泓从“阮、嵇学术承传渊源之差异”、“阮、嵇《庄》学思想之不同”、“阮、嵇文学:难以情测”与“性烈才隽”之分别”三方面探讨了阮籍、嵇康的异同。^[55]刘克桥从“在黑暗政治环境中思想上的不同选择”、“‘痴狂’与‘峻烈’的性格”、“诗歌创作的差异”三方面讨论了阮籍、嵇康的差异。^[56]罗宗强比较了阮籍、嵇康的人格,^[57]余敦康比较了二者的玄学思想;^[46]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主要探讨了二者在文学创作上的不同。此外,黄霞平《论嵇绍仕晋与嵇康“顺世随俗”思想之关系》(《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向秀和嵇康养生思想比较》(《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王冬冬和谢娟《嵇康与郭象认识论思想之比较》(《绥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胡濛哥《大隐能隐显大智,愿隐难隐亦飘逸——浅谈在魏晋动荡时局下嵇康与李密所作的不同选择》(《文学界》2010年第9期)分别将嵇康与嵇绍、向秀、郭象、李密等人进行了比较,王菊芹《刘伶阮籍生存观、现实人格之比较》(《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黄漫《竹林七贤中阮籍与王戎思想倾向的异同》(《文学界》2011年第4期)分别将阮籍与刘伶、王戎作了比较,秦跃宇、龙延《张华与王戎玄儒兼治比较研

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将王戎与张华进行了比较。

3. 阮籍、嵇康与后人的比较研究。在此主要指与陶渊明、鲁迅、曹雪芹、汉斯立克等的比较。阮籍、嵇康与陶渊明的比较,主要集中在他们的自然观、美学思想、悲剧性人生、诗歌创作等方面的比较。据笔者目前所见,共有21篇相关论文。王玲探讨了嵇康与陶渊明的悲剧比较,指出:“嵇知其不可而为之,与屈子的伏清白以死直、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抗争精神一脉相承;陶则知其不可而不为,于庄子逍遥出世的形式下恪守儒家善道。”^[58]孙兰、孙振从种族、时代、环境三方面比较了阮籍、陶渊明诗风形成的异同。^[59]探讨阮籍、嵇康与鲁迅的论文的论文共11篇(日)皇甫积庆指出:“在文学的沟通、晤谈中,鲁迅不仅获得中国传统文学及语言的熏染,更重要的是获得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精神与生命悲剧的共感。同时,他们的相近相通,又有着社会政治、时代价值、文化渊源等多方面的深刻的原因和根据。”^[60]竹林七贤对曹雪芹的影响研究有7篇相关论文,如高晨阳认为:“贾宝玉这个文学典型身上,可以处处看到阮籍的思想及人格的遗传基因”。^{[44](P313)}曹立波从“时人多谓痴”、“谁云玉石同”、“终身履薄冰”、“求仁自得仁”四方面具体探讨了阮籍对曹雪芹的影响。^[61]

还有7篇论文将嵇康与汉斯立克音乐美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如杜卫认为:“嵇康《声无哀乐论》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实质上体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音乐美学体系”。韩传达《阮籍评传》则认为阮籍在生活作风与态度及文学创作方面对后世影响较深,且详细分析了阮籍对左思、郭璞、陶渊明、陈子昂、李白等人的在文学上面的影响。^[35]另外,刘京《杜甫与嵇康》(《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孟永林《“师心谭论”与“别出手眼”——嵇康李贽散论》(《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贾占新《越名任心与向死存在——嵇康与海德格尔生存可能性的终极视域》(《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张向雅《尼采和嵇康

详见杜卫《嵇康与汉斯立克音乐美学思想比较》(《学术月刊》1990年第9期),相似的文章如曹利群《试论嵇康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思想》(《音乐研究》1986年第2期)。

思想之比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裴云、范涛《嵇康和萨特的审美比较》(《兰州学刊》2006年第3期)张节末《论嵇康与康德美学观的异同》(《时代与思潮》(4)——文化传统寻绎》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等分别将嵇康与杜甫、李贽、海德格尔、尼采、萨特、康德进行了比较;魏铭《阮籍、左思五言咏怀诗比较研究》(延边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曹春茹《阮籍、陆机诗歌死亡意识之比较》(延边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陶东风与陈燮卿《为生命忧与替社会悲——阮籍咏怀与陈子昂感遇比较分析》(《社会科学》1985年第9期)赵静蓉《生命与艺术的祭礼——从“醉酒”论阮籍与李白人格精神的异同》(《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1期)邵明珍《王维与阮籍——简论对王维的评价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陈冠明、刘帆《论李商隐无题诗与阮籍咏怀诗的沟通》(《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第3期)分别将阮籍与左思、陆机、陈子昂、李白、王维、李商隐等人进行了比较。

综上所述,百年来竹林七贤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研究方法与视角均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后期的研究成果数量大大增加,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有些特定的专题,受到不同时代学者的一致关注,学者们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同一专题做出不断的拓展与深化,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而总体上对嵇康、阮籍关注较多,对七贤中的其他作家重视不够;对名篇关注较多,其它研究稍弱;以及低层次重复等,则是明显的不足。这也提示我们,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注意整体规划,重视学术史的清理,对于推进竹林七贤研究,都是非常必要,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刘师培著,刘跃进讲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 [2]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A].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3] 胡适.白话文学史[M].上海:新月书店,1928.
- [4] 陆侃如、冯君君.中国诗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 [5]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北京:中华书局,1941.
- [6]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 [7]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8] 霍松林.论嵇康[J].人文杂志,1959,(3).
- [9] 高海夫.略谈阮籍及其《咏怀诗》[J].人文杂志,1959,(2).
- [10] 邱镇京.阮籍咏怀诗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80.
- [11] 余敦康.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演变[J].文史哲,1987,(3).
- [12] 钱志熙.魏晋诗歌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3] 罗宗强.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J].中国社会科学,1991,(2).
- [14] 徐公持.理极滞其必宣——论两晋人士的嵇康情结[J].文学遗产,1998,(4).
- [15] 高华平.阮籍、嵇康与酒及道释宗教之关系[J].江汉论坛,1999,(10).
- [16] 卫绍生.竹林七贤: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N].光明日报,2011-9-19.
- [17] 钱志熙.论阮籍《咏怀诗》——组诗创作性质及其主题的逻辑展开[J].东方丛刊,2008,(1).
- [18] 钱志熙.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9] 顾农.关于阮籍生平的两个问题[J].天津师大学报,2000,(6).
- [20] 孙明君.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作年[J].文史哲,2002,(1).
- [21] 李晓敏.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写作时间考辨[J].文艺评论,2011,(4).
- [22] 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 [23]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 [24] 尚学锋.道家思想与汉魏文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25] 王许林.人生若尘露 天道邈悠悠——论阮籍《咏怀诗》的生命意识[J].社会科学战线,1989,(4).
- [26]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27] 刘上江.苦闷的象征——论阮籍《咏怀诗》的心理体验及叙述方式[J].齐鲁学刊,2005,(3).
- [28] 尚学锋.阮籍《咏怀》的生命关怀和抒情模式[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6).
- [29] 赵沛霖.论阮籍《咏怀诗》——出世思想与《咏怀诗》发展的三个阶段[J].北京大学学报,2010,(3).
- [30] 李海燕.阮籍五言《咏怀诗》张力的语法及篇章结构分析[J].理论学刊,2004,(6).
- [31] 程怡.《咏怀诗·其三》的曲折用典与阮籍的心志[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6).
- [32] 邓小军.向秀《思旧赋》考论[J].文学前沿,2002,(1).
- [33] 甲斐胜二.向秀《思旧赋》试析[J].文史哲,1990,(5).

- [34] 徐公持. 阮籍与嵇康[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35] 韩传达. 阮籍评传[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 [36] 王晓毅. 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 [37] 孙昌武. 嵇康的养生术和游仙诗[J]. 郑州大学学报, 2002, (4).
- [38] 陈允锋. 嵇康音乐审美主体观发微[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94, (3).
- [39] 袁济喜. 关于“声无哀乐论”评价问题——兼论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J]. 学术月刊, 1981, (12).
- [40] 李丹博. 以“和”为美——评嵇康《琴赋》的美学思想[J]. 文史哲, 2003, (2).
- [41] 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 孙良水. 阮籍审美思想研究[EB/OL].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Icdr&s=id=%22087NKNU6045100%22.&searchmode=basic>.
- [42] 丁冠之. 阮籍[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2.
- [43] 高晨阳. 阮籍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44] 余敦康. 魏晋玄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45] 余敦康. 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演变[J]. 文史哲, 1987, (3).
- [46] 丁怀轸、丁怀超. 阮籍与魏晋玄学的演变[J]. 浙江学刊, 1989, (6).
- [47] 刘康德. “竹林七贤”之有无与中古文化精神[J]. 复旦学报, 1991, (5).
- [48] 杨荫浏.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0. ,
- [49] 牛贵琥. 嵇康《声无哀乐论》礼乐批评的再探讨[J]. 文艺研究, 2004, (2).
- [50] 丁冠之. 论嵇康的哲学思想[J]. 哲学研究, 1980, (4).
- [51] 王晓毅. “竹林七贤”考[J]. 历史研究, 2001, (5).
- [52] 孙明君. 汉魏文学与政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53] 伊爱华. 庄子与嵇康人生观比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94, (3).
- [54] 高晨阳. 阮籍与嵇康思想及人格之比较[J]. 东岳论丛, 1993, (1).
- [55] 汪春泓. 玄学背景下阮籍、嵇康之比较[J]. 文艺理论研究, 2002, (3).
- [56] 刘克桥. 阮籍与嵇康之比较[J]. 中州学刊, 2007, (6).
- [57] 罗宗强.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 [58] 王玲. 狂者嵇康与狷者陶潜的悲剧比较[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1, (1).
- [59] 孙兰、孙振. 阮籍、陶渊明诗风形成的异同——有感于丹纳的《艺术哲学》三要素说[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9, (6).
- [60] 皇甫积庆. 从文学到生命——鲁迅与嵇康、阮籍的联系与比较[J]. 鲁迅研究月刊, 1995, (10).
- [61] 曹立波. 阮籍对《红楼梦》的影响举隅[J]. 红楼梦学刊, 1998, (3).

责任编辑：潘文竹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LIU Huai-rong SHI Fei-f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research on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has roughly experienced four periods: the start, slow development, multiple propuls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first two periods were mainly focused on Ruan Ji and Ji Kang ,and the topics were relatively unitary. The next two periods witnessed various approaches and remarkable expansion of perspectives and fields in the research. Not only did the quantity increase distinctly, the quality also improved remarkably, with the research on relative subjects being further deepened. Many masterpieces with distinctly innovative characteristics came out in the form of books and papers. Nevertheless, evident defects existed as well.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to straighten out the history of this study and to summarize the gains and losses in setting directions and making breakthroughs in research.

Key words: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academic history; Ruan Ji; Ji Kang; special subject; comparison